



红军在西吉的八次战斗(下)

什字路战斗

1936年10月3日,红三团四连在位于单家集东南的什字路(今什字乡什字村)、牛家河(今属隆德县杨河乡)扩军时,突然与马鸿宾一〇一旅三〇一团二营六连遭遇。红军指战员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投入战斗,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忙乱迎战,看见红军战士胆气冲天,英勇无畏,作战勇猛,便边打边撤,企图卷土而逃。红军指战员乘胜追击,大喊缴枪不杀,敌人四散奔逃,慌不择路。从战斗打响到结束战斗不到一个小时,红军俘敌24人,缴获枪支20多支。敌余部逃到隆德县城龟缩。

张节子战斗

1936年10月8日,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从静宁县出发,沿葫芦河北上,经静宁县八里铺到西吉县玉桥乡阎家庙、黄岔(今兴隆镇阎家庙村、黄岔村),然后分为两路进攻红军。一路凶猛进攻范家沟,威胁红三团红山根1984阵地,一路以两个骑兵连进攻玉桥乡张节子村(今兴隆镇张节子村)。红一连奉命防守山峰。红五连从兴隆镇潜入国民党军尚未控制的两个村,待主峰部队完成防守计划,安全南撤诱敌深入后,潜入范沟村公堂组,切断敌人后路。红三连直捣范家沟,红二、四连和机炮连随即向主峰猛攻。1890阵地(兴隆镇张节子

村)由团部百余名战士固守。此时,700多名红军指战员已形成对国民党骑兵的三面包围。总攻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面对敌骑兵毫不畏惧,奋勇杀敌,阵地上喊杀声震天动地,枪炮声震耳欲聋。冲在前面的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机枪扫落马下,有的战马被打死打伤,有的战马四散奔逃。敌进攻阵营被打乱打散,人叫马嘶,乱作一团。红军指战员乘胜发起冲锋,敌怕被红军围歼,遂向东南逃窜。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红军打死打伤国民党军70多人,俘敌15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支,缴获战马多匹。战斗中,红三团一连九班班长宋清卿、五连二班战士张育才、三连七班战士海富才(共产党员)等8人受伤;一连二班班长薛家蔡、四连六班班长阎永庶、二连五班战士岳林庆、机枪连战士田英才等5名同志英勇牺牲。红三团将这次战果当晚电报陈赓、杨勇并转报聂荣臻政委。复电称:“伤亡小、胜利大,庆祝红三团击溃敌骑兵二团,巩固了兴隆镇、单家集安全防线,为迎接二方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

玉桥战斗

1936年10月20日,驻守静宁的国民党马鸿宾三十五师第三旅九团由静宁方向分两路向兴隆镇下范、团庄、玉桥进犯,企图夺取红三团驻地兴隆镇、单家集。红三团按照陈赓师长的部署,与静宁游击队协同作战,一起出击,共同打击

兴隆镇战斗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六

敌人。红三团以主力在玉桥村南侧占据有利作战地形,构筑作战工事,以逸待劳,伏击敌人。红三团二连迂回敌后至黄家岔(今兴隆镇黄岔村)设伏,切断进犯之敌后路,并阻击静宁方向援敌,负责打援任务。敌九团进入红三团阵地后,战斗迅即打响。红三团指战员凭借有利地形狠狠痛击来犯之敌,机枪手猛烈打射敌人,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战场硝烟弥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面对敌人连番进攻,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不怕牺牲、英勇无畏、气势如虹,激战2小时后,敌人组织的三次进攻都被红军指战员打退打败。敌团长见红军英勇善战,进攻受阻,占不得半点便宜,又死伤多人,遂令撤退。见敌撤退,红军指战员跃出战壕边打边追,跑在后面的敌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敌部溃退到黄家岔(今兴隆镇黄岔村)时,又中红三团二连埋伏,敌一马姓营长被击毙。此次战斗,红军打死打伤敌人70多人,俘虏185人,缴获步枪125支,轻机枪4挺。之后,团庄、下范国民党军全部溃退到静宁县城。战斗中,红一连三班班长李地忠、三连九班战士王云林、四连七班战士罗耀时等6名战士负伤;一连六班战士张楼都、二连七班战士张士坡、五连三班战士程前伟牺牲。

袁家河战斗

1936年10月27日,红三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率领下从三合乡的老旧堡(李营村)出发,计划经沐(穆)家营(今西吉县城)、新营乡翻越月亮山,实施北上战略行动。在途经城郊乡龙王坝至袁家河(今古强镇龙王坝村、袁河村)时,遭遇了胡宗南一部。三十二军先头部队奋勇作战,给敌以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将敌军击溃南逃。三十二军随即直接向北挺进,沿葫芦河而上。当晚翻越了月亮山,到达了海原县的红羊乡驻营。(据《多彩西吉》)

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派员来宁建党(下)

1931年初,冯玉祥在反蒋战争中失败后,打算重返西北,以甘宁两省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可是,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也想抢占地盘,在西北称王称霸。马福祥保荐其侄马鸿宾为甘肃省代理主席,保荐其弟马福寿为宁夏省代理主席。因此,马鸿宾带一团兵力到兰州去主政。7月,冯玉祥派高参李季军给驻在陕西邠州的军阀苏雨生和兰州城防司令雷中田带信,令其消灭马鸿宾的军事势力。8月25日,雷中田在兰州扣押了马鸿宾,史称“雷马事变”。“雷马事变”发生后,马鸿宾驻宁部队准备开往兰州救援。途中得悉苏雨生、高广仁为配合雷中田反马,率部进军宁夏,又返回银川。由于陕、甘、宁的新军阀与冯玉祥在反马旗帜下联合起来,争夺宁夏地盘,而马氏家族兵力不足,防备空虚。杜润芝认为起义时机成熟,约李天才、梁大均汇集银川,指示他们秘密组织起义事宜。

在银川,梁大均等人首先联络了原宁中闹过学潮的一批同学,他们经常聚集在宁中校门前的文庙里议事。尔后,他们又联络了修械所的赵炮匠,银川东郊掌政桥驻扎的马鸿宾的一个骑兵连,银川小南门内驻扎的一个排,银北地方武装梁韶武、李玉柱,金积、灵武的失意军人朱榜科、王贵川、石万寿、李彪等人。决议以银川为中心,各地同时起事,汇集各路兵力,袭击宁夏城。在银川,决定掌政桥的骑兵连首先起事,由小南门驻军策应,攻打警察局和城防司令部,占领省府。他们刻了印章,制作了委任状,拟定了各路起义军的官职和军衔,将暴动队伍定名为“抗日救国西北军”,以杜培英(即杜润芝)为总司令。实际上由梁大均负责。

李天才回中宁县后,在宁安堡联络了马鸿宾直属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二连连长万金三(即万丰年)、营部文书孙进朝。在鸣沙联络了马鸿宾西路民团团总兼护路大队(后扩编为正规军)大队长张自箴及所部大部分官兵。张自箴又联络了鸣沙地方派王治藩及民团、护路队员和一部分贫苦农民,以及中卫香山等地的民团。确定以孙天才的机枪连为内线,张自箴的护路队为外

线。11月,张德生也去中卫、中宁视察了民团情况。这年冬,李天才一直住在孙天才的机枪连内,制定计划,伺机暴动。约定农历11月17日暴动。农历11月16日晚,张自箴率领护路队队员和贫苦农民数十人,由孙进朝带路,从宁安堡南门外向特务营夜袭(时称“踏营”)。由于把起事日期搞错,提前了一天,李天才、孙天才等人并未准备接应,“踏营”人员遭到还击,起事失败。

在银川地区,由于杜润芝尚在狱中,革命势力缺乏统一指挥,缺乏富有经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错过了有利的时机,没有同苏雨生、高广仁进军宁夏相配合。当中宁护路队兵暴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提前行动。由于宁中学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特别是缺乏斗争经验,他们的行动计划,起事日期在事前均已泄露。落后学生郝文远等人把暴动之事报告给宁夏省代主席马福寿、城防司令马玉麟,致使敌人早有准备,日夜防范。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到掌政桥联络部队起事、提取埋藏的枪支弹药时,骑兵连已被解除武装,人员已被看管起来,埋藏的枪支弹药已被敌人挖去,李振邦等人也被敌人抓获。银川城门紧闭,军警荷枪实弹,参加暴动的骨干李玉柱、余大河、王子仁、赵炮匠、梁韶武、石贵川等人纷纷被捕入狱。

1932年初,由于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干预,打败了雷中田,释放了马鸿宾。国民党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到甘肃省主政,马鸿宾则返宁主政。他为了维持局面,笼络人心,释放了李天才、李振邦等人。4月,由于杜斌丞及南京高级法院熊义堂来电营救,杜润芝获释出狱,离开宁夏到兰州,后受组织派遣到靖远和谢子长等人一起,组织了水泉兵暴。

(四)张德生等重新组织宁夏特别支部杜润芝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又派张德生来宁工作。张德生到狱中见到杜润芝,并与当时担任宁师附小教员兼《民国日报》编辑的地下党员刘梅村接上关系。张德生征得杜润芝同意后,在宁夏省赈灾委员会找到录事工作做掩护,确定了以开展兵运,组织武装暴动作

为党的中心工作。中宁护路队兵暴失败后,张德生离宁到兰州。1932年2月,张德生、郭逸民、张东晓、李罕言开会,会议决定张德生仍回宁夏工作,并联络陕北的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6月,张德生、梁干臣同来宁夏,与原在宁夏的共产党员刘梅村、何高民(又名何飞生)等人协商再次组建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共有7名党员,书记张德生,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这年冬,梁干臣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山慈姑》一文,因有描写苏区群众生活内容而被捕。不久,何高民托财政厅厅长扈天魁出面周旋,取保释放,后去兰州。此时,刘梅村也因环境不利去河南,特支无法再继续工作。杜润芝向陕西省委汇报了宁夏的工作,省委决定成立甘宁青特委。

三、中共甘宁青特委的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党的工作,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为组织委员,常黎夫为秘书。随后,党又派来了张德生、李慕瑜、王建三、梁干臣等人。特委归陕西省委领导。特委成立后,“宁夏、青海、陇南划区,区以下为县,当时区委成立的只有宁夏,下属一校支,一军支。”“校支”指张德生等人在银川以学校为据点建立的特别支部。

1932年底,中共甘宁青特委决定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失败后,暂到宁夏中卫隐蔽的王儒林等人,由中卫去兰州。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将王儒林委任为甘肃绥靖公署招募专员。在特委领导下,王儒林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名义,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员又组织起来,于1933年3月,在靖远、海原交界的西塬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瑜任政委。由于义勇军打起红旗公开活动,引起敌人注意。4月,甘宁青各路敌军对义勇军进行围剿,义勇军失败,300多人壮烈牺牲。

1933年4、5月间,由于兰州兵变、靖远兵变,西北抗日义勇军等相继失败,甘宁青特委部分领导人身份已暴露,党

调张德生、梁干臣到兰州参加甘宁青特委工作,梁干臣先后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由于原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叛徒杜衡的出卖,向敌人写了“陕西共党沿革”,甘宁青特委遭敌破坏,梁干臣被捕,10月英勇就义。张德生、常黎夫等离兰赴陕。吴鸿宾因与马鸿宾同学,来宁夏隐蔽,在省政府以秘书职务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工作。正式成立中共宁夏党小组,发展党员10多人,并通过雷鼎三与该地驻军建立联络关系。1934年夏,孙殿英围攻宁夏,国民党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密电马鸿逵要求将吴鸿宾押送兰州。李翰园将此事告知吴鸿宾,吴鸿宾离银去了北平。党在宁夏的活动又暂告中止。

四、共产国际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

1932年,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潘恩普、奥西洛夫任委员。西北特委原计划设在宁夏,领导甘、陕、宁、青、晋绥六省的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以秘密活动的方式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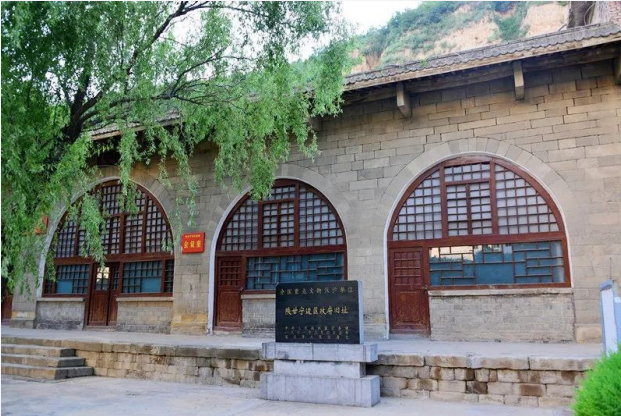
1932年10月,西北特委决定分东西两路从乌兰巴托返回中国。西路是奥西洛夫、潘恩普,先后从乌兰巴托出发,途经蒙古国边城科布多和阿旗首府定远营到宁夏。东路是王若飞和吉合,由朱实夫任交通,经乌得、归绥、包头、五原、临河到银川与西路会合。西路先行的潘恩普一行四人经阿拉善旗巴兰套力盖边卡的沙日茨时,被“防共总管”巴图敖其尔逮捕并押送至阿拉善旗衙门。经过严刑拷打后,潘恩普叛变,不仅供出了先行的四人,而且供出后行的四人是三男一女。当后行的奥西洛夫一行四人进入阿拉善旗巴音吉兰太巴格西顿时,在宿营地被阿拉善旗图克木巴格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林指示属下呼肯扣一伙设计杀害。

东路王若飞一行,在包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所以,共产国际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计划未能实现。(据《中共宁夏党史简明教程》)

中有共产党的号召为由逮捕了杜立亭和张润芝,解聘了郭逸民等进步教师,宁夏中学党党组织随之解体。杜润芝在宁夏监狱中,利用看守对李天才、梁大均等探监时管理松弛的机会,了解监外的情况。在地下党员杜润芝的动员下,梁大均、杨生连、张绍翎、高尚文等二十几名青年学生,通过在马仲英教导队任教官的高立仁的关系进入教导队。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杜润芝想借机逐步控制马仲英的教导队,为革命所用。1930年秋天,马仲英率1000余人前往河西走廊,自称甘宁青司令,他们认为马仲英根本没有革命的愿望,争取不过来,只好暂时先留在里面见机行事。(据《中宁文史资料》)

陕甘宁边区是怎样反敌特的？

从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起,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伺机渗透和破坏的“眼中钉”。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敌特活动,“全民皆兵”的严密防守,使得敌特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日寇活动猖獗

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敌人特别“加强特务工作”,这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总的来说,日本特务机关对边区的渗透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派奸细潜入边区,钻进我党政和学校机关内进行秘密破坏。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4月,延安保卫机关破获日本间谍、特务机关案件共计73起。

二是在边区内部组织反共力量,指挥其进行破坏边区的勾当。1937年至1938年间,边区内外土匪共有百余股势力,多为日寇别动队。其中有李清武股在劳山截击周恩来汽车,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寇,边区绥德分区、关中分区的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等。

日寇的渗透活动,使我党遭受许多损失。《解放日报》曾多次通过公开报道及评论进行揭露与谴责。如1941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运用公开的与隐蔽的侦探奸细,在各地收买汉奸,建立傀儡政权,挑拨反共战争,在前方则瓦解抗日部队,在大后方则窃取国家机密,其各种破坏行为,予中国抗战团结事业以重大的损害。”

我党了如指掌

对于日寇“对边区暗中进攻是如何的阴狠和普遍”,我党可谓了如指掌。

党中央数次在指示、决议中说明敌特的渗透活动,要求加强锄奸反特工作。毛泽东、任弼时以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等也多次指出敌特对边区的渗透。毛泽东曾在一封电文中明确指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年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边区党委和政府处于反敌特斗争的第一线,多次说明日本特务机关阴谋渗透边区的情况。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在边区一级活动分子会议中指出,“日寇的奸细到处活动,我们正在组织锄奸团,消灭这些家伙”。

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其中,“暗的仗”就是反敌特奸细等斗争,“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

粉碎敌人阴谋

对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渗透活动,我党把反敌特斗争作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从容应对,灵活处理。

在中央层面,党政军内部开展了防间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动,并于1939年2月成立中央及各级社会部等反特工作领导小组机构,发布《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指示、章程。边区层面,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社会部,张邦英任部长。

执行层面,据曾任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的周兴回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则设立了保安处负责边区的治安、情报、反间谍等工作。”依据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边区保安处主要负责“敌探汉奸之侦查、缉捕、处置”“人民锄奸组织之指导”,以及“其他有关边区锄奸事项”等。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等军事系统也成立锄奸局,负责肃清军中内奸,在军外主要是捕捉汉奸敌探、平定汉奸土匪的暴乱等。

边区政府还公布防奸公约,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检举特务等。1939年11月的一份统计显示,时有群众哨站1004个,锄奸团员129523人。如此一来,边区建立起严密的锄奸组织和网络,可谓“全民皆兵”。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边区保卫部门的精心布置下,边区反敌特斗争成效斐然。据记载,1937年至1939年1月,共破获敌探汉奸案件100余起。1937年至1939年底,庆阳、关中分区及所属各县共抓获日本奸细86名。边区反敌特的伟大斗争,为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党和边区的秘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和维护根据地的社会治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1941年1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反敌探奸细的斗争”这条战线上,“我们依靠着边区全体一致的努力,不断地粉碎了敌寇特务的挑拨,保卫了边区的治安,保卫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

(据共产党员网)

宁安堡南洋行踏营始末(三)

拉垮,最后将其赶出宁夏。

1930年10月15日,宁夏中学发生学潮。梁大均和李天才(中宁枣园人)带头声援,坚决反对开除杨生连。由于学校态度强硬,梁大均和李天才等决定发动全校学生举行罢课。这时,学校地下党负责人,原中共北平市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杜润芝与郭逸民等分析了斗争形势,建议梁大均和李天才广泛联络进步同学,提出“驱逐绅士校长徐宗藩”“拥护杜立亭(原教务主任)当校长”等口号。李天才和梁大均到各班召开演讲会,组织积极分子在校内外张贴标语,轰轰烈烈的罢课活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宁夏省政府对学潮采取高压手段,派出警察抓走杨生连等13名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同学,杜润芝等发动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使学潮越闹越大,轰动于宁夏省城银川。由于梁大均被列入逮捕名单,李天才单独承担学潮的领导工作,他四处奔走,动员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动员被捕同学在看守所“闹狱”,使政府当局陷入被动局面。在社会舆论和学生不屈不挠的抗争下,当局不得不接受师生的要求,将原校长徐宗藩调离,由进步教师杜立亭接任校长,并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为党在宁夏中学开展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潮取得胜利以后,宁夏政府当局怀疑事件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不久,便以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芝信